

“理想”与“新媒体”： 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丁方舟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有两个核心话语：“理想”与“新媒体”。“理想”话语主要建立在“理想/现实”这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并通过溯及“过去”反衬“现在”。在话语再生产过程中，新闻人运用集体记忆和个人化框架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建构“理想”神话，以此批判新闻业现状，重塑专业准则，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新媒体”话语则主要建立在“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以此来展望“未来”反思“现在”。新闻人因其所处新闻场域位置的不同，分别策略性地建构“新媒体”神话或“传统媒体”神话，从而正当化其转型或留守的职业选择，在变动的场域结构中重新寻找得以安身的位置感。随着新闻场域结构化转型过程的深化，“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之间越来越呈现出意义交锋的趋势，并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多重时空语境中构成了一个杂糅的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

关键词 理想 新媒体 阐释社群 话语建构

一、引言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的两个核心话语：“理想”与“新媒体”。前者由来已久，但在当代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再生产中衍生出新的意义；后者是社会化媒体大规模发展以来的产物，与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互为形塑的关系。这两个话语不仅伴随着两组经典的二元对立：“理想/现实”“新媒体/传统媒体”，且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多重时空语境中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杂糅的话语体系和知识神话，主导着当前中国新闻社群对自身及其职业的自我阐释与意义建构。

本文想要追问的正是这两个话语如何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成为中国新闻社群使用最多的主导性话语，新闻人如何运用符号资源策略性地建构这两个话语，它们何以被神话化，以期维护或挑战何种优势性的权力关系，这样的阐释行动如何揭示了

新闻人在冲突和维护固有秩序之间寻找自身认同的努力，中国新闻社群又如何通过这样的努力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概言之，本文的目的在于将这两个话语重新问题化和历史化，回溯话语形成的逻辑与发展脉络，揭示话语建构过程中行动者的策略及其与权力关系间的互动关系。^[1]

那么，如何寻找到合适的经验材料说明以上问题呢？新闻人的自我言说与集体阐释形成于微观的话语网络中，这一网络在多个时间节点的多个场景上展开。为此，本文首先将新闻人群体视作“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在此意涵下，作为社群成员的新闻人有可能围绕关键性公共事件或特殊的热点时刻（hot moments）展开集体阐释，分享专业原则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矛盾，重申规范性准则，从而强化身份认同，巩固职业正当性及权威性。^[2]因而，有必要找到这样的事件或热点时刻，分析新闻人何以通过相应的集体阐释来解说或重构其共享话语。

通过对经验数据的话语分析，本文想探讨的问题包括：“理想”话语如何通过符号资源的再生产成为一直主导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这一话语如何被神话化，其中包含新闻人的何种策略性意图？“新媒体”话语如何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成为“理想”之外的又一个主导性话语？新闻场域中处于不同位置的新闻人在阐释“新媒体”话语时采用了哪些不同的策略？中国新闻社群围绕“理想”话语和“新媒体”话语建构的知识神话旨在维护、挑战或建立何种权力关系，它们如何被正当化？新闻人如何通过反思性的话语实践破解这两个神话？这两个话语之间体现出怎样的张力？话语建构过程中体现出怎样的策略性、反思性与表演性特征？话语建构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关系？

二、阐释社群与新闻人的话语建构

在泽利则（Zelizer）的理解中，新闻人作为“阐释社群”的成员，通过共享话语和集体阐释建构有关新闻职业的意义，与其他成员形成非正式的连接，从而构成一个话语基础上的新闻社群。^[3]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经常围绕关键性公共事件或特殊的热点时刻展开，相关阐释伴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变迁，每一次的重新阐释都可能对专业原则的修补和重构，通过这样的话语实践，新闻人得以塑造和维护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及文化权威地位。换言之，话语作用的领域就是意义争夺和权力关系展开的领域，新闻人正是通过生产和建构话语的意义，塑造有关新闻职业的知识，形塑新闻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4]

从阐释社群的概念出发，新闻人聚合为社群的基础就是一起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聚焦于当下的热点事件，也有可能聚焦于共同的过去。由此，泽利则将新闻人讲故事的模式划分为“现时模式”（local mode）和“延续模式”（durational mode）。^[5]现时模式聚焦于“现在”，其中新闻人是事件的见证者，他们共同就某一新闻实践是否符合专业标准展开辩论，以框架化的阐释方式组织话语。

延续模式则意在回溯过去，新闻人通过对过往的历史事件进行再解读，赋予事件新的意义。延续模式要求新闻人将自身置于连续的时间线条中，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节点的形塑下重新书写新闻业及个人职业的历史。^[6]

除了“过去”和“现在”以外，新闻人的话语生产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时间维度，即“未来”。新闻人在进行话语阐释时，不仅仅是在衡量过去和现在，更是为了界定日后新闻实践的标准，因此“未来”始终作为一个自变量，影响着新闻人的认知、话语和行动。^[7]新闻人在面对和处理当下困境的时候，无论是溯及“过去”的集体记忆和荣耀，还是以“未来”的前景照射当下的“风险”，都是在延续的时间线条中书写自己的历史。^[8]概言之，话语生产要求新闻人将自己置于“双重时间”（double-time）甚至多重时间的语境中，同时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复杂关系。^[9]

三、符号、话语、神话与权力关系

符号如何被神话化？巴尔特认为，所谓的神话化过程，就是使符号转变为适合社会自由利用的言说状态，使历史的现实呈现出“自然”之貌。所谓自然化，就是将符号锁定在特定的意义上，从而形塑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使之失去反思的能力。^[10]而知识神话，就是一系列在特定文化中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广为接受的概念。^[11]神话化的目的，就是正当化，使之呈现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并无声无息地植入价值系统。^[12]

符号如何关联到权力关系？在韦伯的定义里，权力即某一关系中的行动者有多大可能推行自己的意志，行动者对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必然存在竞争、冲突和选择，因而，权力关系意味着一种支配性关系。^[13]韦伯更关注建立在实质性力量基础上的权力；布尔迪厄则认为，除了这些可见的权力，另有一种不那么可见的隐性权力，即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这种权力通过对符号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形成一套社会分类系统，树立区分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建构社会认知框架，成为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基础。^[14]

换言之，权力关系的建立有赖于对符号资源的策略性运用，从而生产内化于被支配者内心的认知结构，辅助客观社会结构的持续存在，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的正当性。^[15]这套认知结构是在历史语境中经由权力支配者的策略性行动生产出来的，因而是武断的、任意的，但是其作用的方式却是使得自身中性化和去政治化。连接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的是行动者的“惯习”，即个体在家庭、学校、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整套性情倾向，惯习规导并生成实践，而所谓的实践就是行动者在特定场域的策略性行动。惯习既是结构性的结构，又是建构中的结构。实践遵循的是“模糊的逻辑”（fuzzy logic），而非全然的“理性的目的逻辑”，它既受制于特定场域的规则，又具备反思性。^[16]

福柯更进一步将关注点从符号转向话语，探讨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福柯所谓的话语，是指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产生的有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各种规则和实践，因而话语同时涉及语言和实践。福柯的权力观是一种微观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通过话语的表征系统生产知识和意义。^[17]福柯指出，权力是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中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是一个微观的、循环的、流动的生产性网络。话语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权力的障碍和抗力，既承载和生权力，又揭示和削弱权力。^[18]

福柯将话语视作一个需要解释的意义场，知识和权力在其中得以连接，人人都处于循环的权力网络中，其主体性和身份认同又不断经由流动的意义得以重构，因而并没有稳定的权力中心。^[19]权力只有部分掩盖自己的机制才能获得容忍，所以话语和知识承载权力运作的的关键就在于将自身去历史化。为此，福柯的研究致力于将被遮蔽的知识和权力机制重新问题化和历史化，避免中心化的结果。^[20]

虽然布尔迪厄和福柯都强调关注符号、话语和权力的积极生产性，但本文认为，他们仍忽视了多元行动者（actor）的能动性（agency）。布尔迪厄过于强调权力关系的支配性，忽略了被支配一方的能动性，福柯过于强调话语对主体性的建构，忽略了微观权力网络中行动者对话语的有意识建构。话语固然会形塑认知和行为，但借用阐释社群的概念，本文更进一步将新闻人个体视作具有能动性和反思性的行动者，从而探讨中国新闻社群中的行动者如何在权力网络中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阐释等行动历史化地建构有关自身及所在情境的意义，从而维护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巩固自身的身份认同，或正当化其职业转型选择。正是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将考察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四、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每年11月8日的中国“记者节”作为获取文本数据的首要热点时刻，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新闻人更有可能产生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进而阐发新闻职业对自身的意义。本文将立足于社会化媒体大规模发展的2010年至2014年来展开研究，其用意在于捕捉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发生显著转变的关键性时段，即“新媒体”话语兴起，并与“理想”话语形成交锋的这一时期。因此，本文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首先选择中国新闻人社群使用最多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作为检索平台，设置关键词为“记者节”，检索时间范围为2010年至2014年每年记者节11月8日的0时至23时，在检索得到的结果中抽样，由认证为新闻人的用户发表的原创微博和带评论转发微博，具体方法为首先在Excel中运用“=rand()”公式向下填交至1000，产生一个随机数列，取第1-100行，以对应的随机数在每次检索得到的共计50页1000个结果中取值，如果该条微博与“记者节”无实质关系，则继续取第101个随机数的样本，由此类推得到每年的100个样本，最终得到5年500个样本。同时，选择“澎湃新闻”上线等热点时刻中新闻人在社会化

媒体平台上发表的文本、接受访谈时的言论等作为补充性的数据来源，再对这些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并梳理“理想”话语的建构逻辑以及“新媒体”话语的发展脉络。

五、“理想”神话的建构逻辑

本文首先梳理了2010年至2014年期间“记者节”当日中国新闻人所发表的微博。研究发现，除去无实质内容的高频词以及“节日快乐”等仪式化的表述，“理想”每一年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描述词之一，这表明“理想”话语在当前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新闻理想”意指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梦想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21]但在中国新闻社群的集体阐释中，“理想”更是一种有意识运用的符号资源，一种表征和建构权力关系的话语，其中包含着新闻人巩固身份认同与职业正当性的策略性努力。具体而言，新闻人对“理想”话语的建构主要致力于呈现“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时间节点间的矛盾，这一过去包含两层意涵：其一，涉及新闻社群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集体记忆，具体指向三个关键性时段：民国时期、1980年代与“黄金十年”；其二，涉及个人职业理想与新闻实践间的矛盾。

（一）民国时期的救国理想与新闻理想

首先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中国新闻业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理想和救国情怀，可以说“民国”这一符号资源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场域的怀旧话语中都占据重要分量。具体到新闻场域，新闻社群同样聚焦于民国报人的新闻实践及其历史话语来重构“理想”话语。无论是张季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林白水的“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还是邵飘萍承继自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等，都仍是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社群用以诉诸“理想”的高频符号资源。通过这样的话语再生产，新闻人感慨先辈们的独立人格（样本414），批判新闻业现状，并期望民国记者的精神得以延续（样本304）。换言之，“过去”成为了衡量“现在”的标准。

在民国的历史语境中，这些符号资源表征的是民国报人“新闻救国”的理想。进入当代中国社会语境，救国理想去历史化的同时，新闻理想更进一步与职业理想相关联，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中国新闻人以新闻事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愿景。换言之，在“理想”话语的再生产中，既包含了新闻媒体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社会公器，应拥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自主性，以客观、公正、负责任的原则进行报道的当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22]又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民国报人“文人论政”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23]这些概念通过新闻教育和新闻人的重复阐释进入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体系，并被共置于“理想”符号中，从而在民国报人的新闻实践与新闻理想间建立起人为的因果关系，“理想”符号由此被神话化。当这一神话不断被

用以阐明专业准则时，即成为福柯所言的话语和知识，巩固了布尔迪厄强调的符号权力和社会秩序。这一秩序，就是新闻业因其规范化新闻实践而树立的文化权威地位。

因此，中国新闻社群对民国时代的一再阐释，不仅仅是在“怀想一种具有乌托邦理想色泽的光彩人生”，^[24]更是一种策略性的行动，其目的在于批判当下中国新闻业缺失的“理想化”新闻实践，修补或重构专业原则，界定规范化的新闻实践标准，并呼吁新闻人回归专业原则以期恢复新闻业往日的荣光。由此，“理想化”的新闻实践这一知识得以回暖和重塑，新闻业的正当性基础以及新闻人的身份认同得以巩固。这一过程就是布尔迪厄所言的区隔、分类及建构认知框架的过程，他曾批判性地揭示社会等级秩序何以建立在多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25]“理想”话语除了指涉时空维度上的过去与现在，更是建基于一组经典的二元对立：“理想/现实”，其中“过去”被神话为完美的“理想”，“现在”被架构为不完美的“现实”，正是在反思性地看待“现实”的基础上，作为对立面的“理想”才得以彰显其意义。

新闻人对“理想”神话的建构，固然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性行为，但这一话语背后是否存在被忽略的权力关系？事实上，李金铨在《记者与时代相遇》里就展示了民国报人的生命经验与时代历史相遇时，同样难以避免结构化因素的左右，因为他们不能只作孤胆英雄，同样需要安身立命。^[26]而当代中国新闻社群在回溯民国新闻史时，却忽略了民国报人彼时的话语建构何尝不是对其所处社会情境的批判式回应？民国报人又何尝不是纠缠于自身的理想与困顿的历史现实之间？民国报人同样是另一个时空的阐释社群，以话语生产回护当时新闻业的正当性基础，他们使用的符号资源，在历经代际更替之后，又为当代中国新闻社群所捕获。神话是通过悬置和忽略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来达到遮蔽权力关系的目标的，^[27]当代中国新闻社群正是通过部分悬置民国时代的历史语境，来塑造“理想”话语的知识神话。

（二）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

1980年代同样是中国新闻社群热衷于讲述的集体记忆。有新闻人就回忆称，记者在1980年代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而今不少同行的所作所为则不复当初“青涩的新闻理想”（样本87）。这表明，围绕1980年代展开的“理想”话语建构除了怀旧以外，更是为了反思当下陷入困境的新闻伦理和由此伤及的新闻业权威性，再次印证“理想”的意义是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上彰显出来的，而此处的“理想”表征的就是新闻场域的自律性操守。

除了新闻伦理困境这一“现实”，围绕1980年代建构的“理想”话语映射的另一个重要“现实”就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业急剧转型。“澎湃新闻”上线时，主编邱兵在发刊辞中讲述了一段个人化的故事以献给“我们恋恋不舍的1980年代”，文中意指新闻理想的隐喻——“我心澎湃如昨”既唤醒了同代人对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集体记忆，又与其他新闻人的个人职业理想产生共鸣，因而在新闻社群中产生很大回响。^[28]此处的“理想”与“现实”以1980年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作为划分

标准，因而表征的正是数字化转型逻辑主导下新闻实践与其专业原则的背离，二元对立的比较之下价值系统被无声无息地植入，“理想主义”再次被神话化，以坚持“理想主义”为主旨的新闻实践则得以正当化。

然而，话语作用的领域也是意义争夺的领域，阐释社群成员对同一话语的阐释行动同样可能包含各种协商和冲突。有新闻人就称“理想主义”这一精神家园早就难以拯救新闻业动荡的现状。^[29]更有人意图祛魅“理想”神话，认为“以理想和情怀示人，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目的”，^[30]即这种话语生产是一种表演性行为。表演性行动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其他行动者是否相信其“本真性”（authenticity），正是因为部分新闻人相信“理想主义”包含的本真性，这一符号资源被运用时才能得到很好的动员效果。^[31]然而，新闻人对“理想”话语的意义争夺表明，话语虽然经常以去历史化和表演性的面貌出现，但作为一个需要解释的意义场，并非所有的行动者都受到话语的规训作用影响，理所当然地接受话语所想推及的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权力网络中的行动者仍然具备对话语和知识神话的反思能力。

（三）“黄金十年”的未竟理想

中国新闻社群集体记忆指向的第三个关键性时段是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左右市场化媒体与调查报道发展的“黄金十年”。彼时，调查报道随着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迅速兴起，大批优秀的调查记者得以涌现，因此也被新闻人称之为“一稿成名”的年代。可见，“黄金十年”的“理想”既表征以调查报道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愿景，也表征成功的个人职业发展。

那么，当代中国新闻社群如何通过“黄金十年”的集体记忆重构“理想”话语？常见的一种表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媒体理想，我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32]可见，对亲历“黄金十年”的新闻人来说，“理想”的难以为继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受限于年龄、薪酬、做调查报道的风险等因素，职业转型成为他们在“现实”面前的无奈选择。^[33]由此，对使用“黄金十年”建构“理想”话语的新闻人而言，“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的区隔在于“黄金十年”过后自主性报道空间的紧缩，因此新闻人自觉难以通过新闻报道履行监督公权力运行的规范性角色，也无法实践其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理想。换言之，通过将“黄金十年”的意义锁定在充分的报道自主性和规范化的新闻实践上，新闻人又一次神话化了“理想”话语。

这一神话的建构过程包含了新闻人的三大策略性意图。其一，彰显近年来新闻业陡增的政治压力和生存压力。但回溯历史语境，新闻机构从未凭借商业化运营脱离政治场域的规制，更不必说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本身就会影响新闻机构的自主性，所以即使是“黄金十年”期间，新闻业的自主性也从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新闻人神话化“黄金十年”的策略性目的实为批判新闻业现状。其二，巩固自身在新闻社群中的优势性地位。不难发现，运用这一话语的多为在“黄金十年”中取得成就的新闻人，表明这其实是部分新闻人事业发展的黄金期，虽然使用了“我

们这一代人”这样指涉集体记忆的表达，但其中仍然忽略了更多不知名的新闻人，悬置了他们面对的非优势性历史条件。其三，正当化其职业转型选择。不少新闻人都是在选择职业转型的关口或已经转型后提及“黄金十年”的集体记忆，一则回忆荣光，二则也是通过“理想”的失落来正当化转型选择的必然性。

（四）职业理想与生活所迫

上文揭示了中国新闻社群何以围绕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关键性集体记忆建构“理想”话语，下文将考察新闻人何以通过溯及个人过往的职业理想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矛盾来参与“理想”话语的生产。换言之，不同于集体记忆框架，这部分的话语阐释更多建立在个人化的框架上。具体而言，新闻社群围绕个人职业理想展开的话语阐释分为四种方式：阐发造成新闻理想困境的多元因素；表达新闻理想失落带来的纠结情绪；以新闻理想巩固职业正当性和身份认同；反思“理想”神话。根据数据统计，四种阐释方式在2010年至2014年间的分布比例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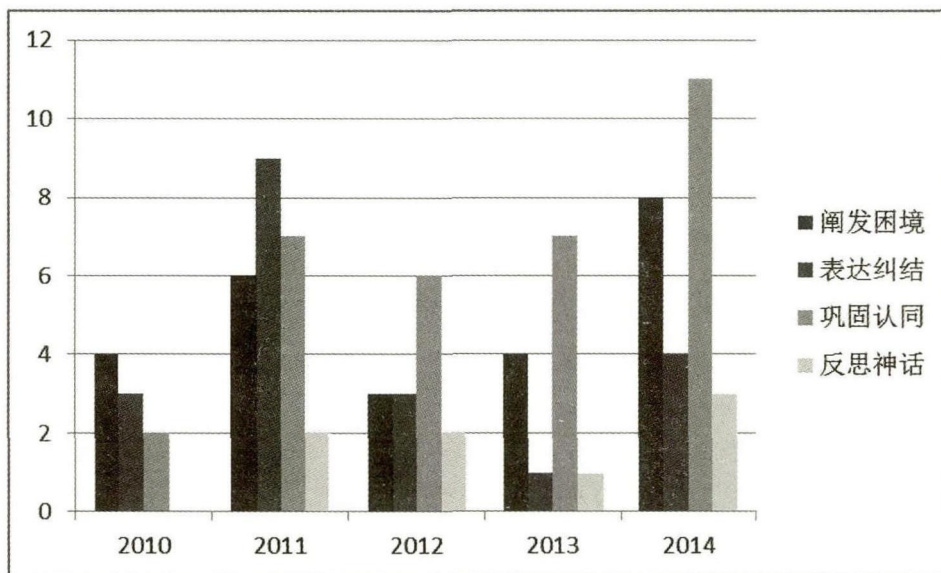


图1 “理想”话语的阐释方式（2010-2014年）

在阐发困境时，新闻人通常直指困扰其职业理想的多元因素，具体包括：“盈利危机的重压”（样本404），这是商业因素；“新闻管制愈加收紧”（样本73），这是政治因素；“报业黄昏”（样本493），这是技术革新因素；“反应慢的会被漏稿整死，身体差的会被加班累死，有理想的会被领导憋死”（样本155），这是机构因素；新闻寻租事件频发导致的“公信力一天不如一天”（样本411），这是伦理因素。这表明，“理想”话语的意义又一次建立在比照“现实”的基础上，意在表征结构化因素对新闻人履行规范性角色的制约。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新闻人自觉“生活更加现实，理想更加骨感”（样本12），并将纠结情绪的表达寄托于两组二元对立：“过去/现在”，“坚持/放弃”。无论是职场新人（样本12）还是人行已久的老记者（样本196），都表示最初的理想渐行渐远（样本145），有人表示长路漫漫，要继续坚持（样本473），有人纠结于是否放弃（样本250），也有人借“记者节”宣布放下牵挂带着理想冷静告别（样本419）。可见，此处“过去”溯及的是进入新闻职场前的个体生命经验，坚持或放弃等情绪表达也更多体现了个人化的身份认同危机。

而坚定留守的新闻人则不断呼吁对“新闻理想”的回归。不少新闻人强调，“新闻理想和良心才是坚守这个职业的根本和动力”（样本496），这份理想就是“对真相、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样本432）。这表明在遭遇认同危机时，新闻人选择策略性地运用“新闻理想”这一符号资源来表征专业主义操守及社会责任感，从而维护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可见，“理想”话语某种程度上也是新闻社群的一种抗争性话语，意在抵御危机时期带来的压力。

另一方面，阐释社群中的其他新闻人却意图反思“理想”神话。有新闻人指出，同行们在微博上不断生产“理想”话语，有过度营销职务身份之嫌（样本124）。更有新闻人指出，“理想”神话过于拔高了新闻业的崇高性或权威性，坚守职业道德才是新闻人的本份（样本259）。可见，这部分新闻人意图揭示“理想”神话中被自然化的新闻业权威性这一概念，道破其去历史化的实质，并将“理想”话语的落脚点放在自律性的职业操守上。

通过以上的话语分析，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新闻社群如何通过民国时期、1980年代、“黄金十年”的集体记忆以及个人职业理想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矛盾来建构“理想”话语。集体记忆与历史话语在进入当代时空语境后，成为话语再生产过程中被加以策略性运用的符号资源，再加上新闻人利用个人化框架展开的话语阐释，合力塑造了中国新闻业在历史上从未真正获得的新闻业独立性、自主性、规范化及权威性神话。这一知识神话悬置了一直制约着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结构化因素，其策略性目的在于反思“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批判当前新闻业现状，重塑规范化的新闻理念和职业准则，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及文化权威地位。

从“理想”话语的持续升温不难看出，当前制约新闻业发展的制度化因素已对新闻人的身份认同造成结构化危机，因而新闻社群希望通过符号权力的再生产回护其固有的社会地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理想”话语也是新闻社群的一种批判性和抗争性话语。同时，“理想”话语虽然经常以去历史化、神话化和表演性的面貌出现，新闻人却并没有失去反思神话的能力，而是对“理想”话语的意义展开协商和争夺。

此外，本文的逻辑是从现有的话语实践看新闻社群对集体记忆的再阐释，反过来看，不难发现这三个关键性时段正是“理想”话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语境，正是通过历代新闻社群在相应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新闻实践与历史话语建构，新

闻教育的传承与规训，以及一代代新闻人的话语再生产，“理想”话语才得以在持续不断的意义协商中成为中国新闻社群的主导性话语。

六、“新媒体”话语的发展脉络

接下来，本文将探讨“新媒体”话语的发展脉络。根据新闻人在2010年至2014年“记者节”期间发表的微博，以“新媒体”作为其表述主题的微博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并在意义上与“理想”话语形成交锋，可见，“新媒体”已发展成为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的另一个主导性话语（见图2）。“新媒体”话语主要建立在“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上，呈现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张力。这一始终作为自变量存在的“未来”，意指的正是新闻业尤其是传统媒体面临的风险与未知的前景。新闻社群围绕“新媒体”展开的话语再生产，既是新闻人对中国新闻场域结构化变动的策略性回应，更体现出新闻人在冲突和维护固有秩序之间重新定义身份认同和职业意义的努力。换言之，新闻人作为行动者，通过对“新媒体”话语的阐释行动在新闻场域的结构化转型中不断调适和寻找新的“位置感”。^[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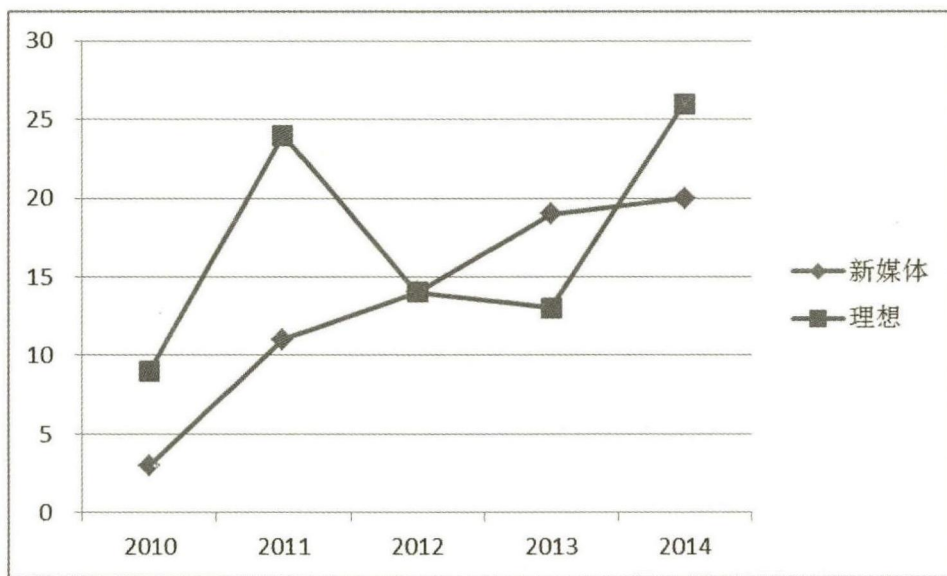


图2 “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的变化趋势（2010-2014年）

（一）有关“未来”的意义争夺

为此，新闻人首先就这一不确定的“未来”展开意义争夺并诉诸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具体而言，这一“未来”指向四种意涵：新闻生产的未来、新闻业的未来、新闻伦理的未来以及个人职业选择的未来，四种阐释方式在2010年至2014年间的分布趋势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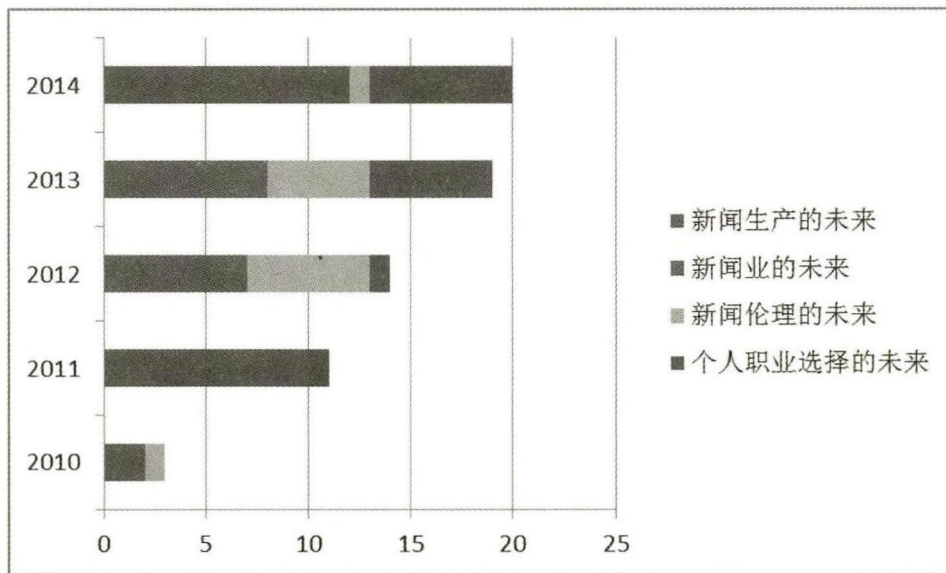


图3 “新媒体”话语的阐释方式（2010-2014年）

在社会化媒体发展初期的2010年，新闻业还未受到太大波及，因而新闻人主要围绕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变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展开“新媒体”话语的阐释。其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记者”等表述（样本90）说明新闻生产方式正在从组织化向社会化过渡，^[35]但新闻人对这一“未来”多数持乐观的态度，因为彼时的新闻人认为“这没有抢记者的饭碗，而是激发了更多人心中揭露曝光真相的冲动”（样本248），换言之，新闻人认为公民赋权与自身承担的规范化角色将形成互为助益的局面（样本57）。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公民记者”“自媒体”等概念和实践逐渐发展起来，新闻人也开始反思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伦理，表示应警惕公民记者报道可能存在的不完整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客观性等伦理准则（样本222）。由此可见，新闻社群开始以伦理为界限在自身和公民记者之间作出区隔，建构二元之间的权力关系。但新闻人的权力关系建构策略并非排斥新媒体，而是试图将公民记者、自媒体等概念纳入新闻场域的“新媒体”话语生产之中，从而争夺话语意义的解释权，划定话语阐释的空间及分类标准。^[36]

与此同时，新闻人开始更多谈论“传统媒体”面临的困难及新闻业可能的“未来”，“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正式形成。当新闻人刻意强调传统媒体时，一方面意在表征传统媒体岌岌可危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表征新媒体技术革新可能引发的新闻业危机和个人职业危机。至此，新闻业的未来和个人职业选择的未来这两大变量开始成为影响新闻人认知和行动的主导性框架。从A话语分布趋势来看，2013年至2014年新闻业急剧转型期间，这两大阐释方式的确出现了剧增现

象并在“新媒体”话语中占稳核心位置，而新闻人曾经对新媒体抱有的乐观期待，也转变成了面对个人职业困境和风险时的复杂情绪。

故而，围绕“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形成了一张多样化的话语网络，其中不同境遇的新闻人因其在新闻场域的位置差异而采取不同的话语阐释策略。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新闻人之间，早在传统媒体新闻人刚刚惊觉传统媒体的前景是否堪忧之际（样本 187），网络媒体新闻人就已喜迎这样的变化（样本 188）。可见，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初期，传统媒体新闻人开始认知到自身在新闻场域中的优势地位有动摇的风险，网络媒体新闻人则期待着这一权力关系的转变。而当 2013 年以后传统媒体面临的风险加剧，悲观情绪随之在传统媒体新闻人中蔓延开来，有人预感“记者过节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样本 341），“黄昏”“末路”等负面描述词频频出现，但网络媒体新闻人也没有获得他们期望的权力关系平衡，因为发现网络媒体仍“不如传统媒体那么受重视、那么权威”（样本 389）。

由此可见，“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隐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即传统媒体及其从业者在新闻场域固有的优势性地位，即使各种“未来”的风险不断威胁这一地位。但当这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话语被反复提及时，同时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故而，不少新闻人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传统媒体和权威性之间存在“自然”的因果关系，“传统媒体”从而被神话化。如有传统媒体新闻人就表示网络编辑算不上是真正的新闻人（样本 423），而转型至新媒体的新闻人同样在惯习的作用下不自觉地矮化自身所在的网络媒体，称虽然转型后“拿着翻倍的工资”，却仍有“淡淡的忧伤”，因为大部分网站记者仍然没有资格持记者证（样本 495），可见纵使转型后的新闻人获得了经济资本上的优势，在符号资本上却仍自觉处于弱势，这也印证了符号和话语对权力关系的建构作用。

然而，话语既承载权力关系，也削弱权力关系。^[37]部分成功转型的新闻人就试图扭转新闻场域固有的权力关系，指出“传统媒体的管理其实是最落后的”（样本 305）。可见在对意义的争夺上，“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同样可被用于阐释传统媒体的“旧”与“落后”，凸显新媒体的“新”与“进步”，二元之间的价值高低由此倒错，“传统媒体”神话由此被破解，“新媒体”神话也就此建立起来。这说明，新闻场域的行动者因其所处位置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阐释策略，其目的则是为了建构自身在新闻场域权力关系中的优势性地位。

新闻社群对于新闻业“未来”的意义争夺还表现在对传统媒体应对方式的多元阐释上。有人依然认为内容为王（样本 344），有人强调经营思路转变（样本 451），有人则坚持提高公信力才是根本（样本 499）。此外，新闻人也在反思“未来”媒体人的职业技能，有新闻人就调侃要“以一个产品经理的标准要求自己”（样本 490）。可见，新闻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场域对新闻场域的规则侵入，互联网企业以产品为核心的经营思路在此被视为一种“未来”的趋势，促使新闻人

反思传统媒体“现在”的运营方式，这些反思性的话语实践正是为了在转型冲突和固有的新闻场域秩序之间重塑传统媒体的正当性基础。

（二）转型过程中的位置感

中国新闻社群围绕“新媒体”展开的话语阐释还建立在对“转型”这一符号资源的意义争夺上。数字化转型正在不断重构中国新闻场域的结构，新闻人作为置身于结构中的行动者，既受到结构的制约，也在以自身的能动性参与重塑建构中的结构，^[38]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抉择就是职业转型。由于传统媒体的式微，本来在新闻社群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传统媒体新闻人逐渐感觉到这种优势位置感的消逝，积极转型的新闻人同时以行动和话语重构新闻场域的权力关系，纠结中的新闻人以话语阐释表达身份认同危机下的焦虑感，坚定留守的新闻人则策略性地借用多种符号资源重塑新闻职业的正当性。

选择积极转型的新闻人首先在情绪表达上将自身与纠结中和选择留守的新闻人区别开来，强调“所有人悲观我反而乐观”，因为旧体系的瓦解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并希望未来涌现更多新的探索者（样本 402）。其中，“新/旧”“乐观/悲观”“现在/未来”等二元对立组合正是意图表征旧有新闻场域格局的僵化以及未来传媒生态的前景看好，由此，二元之间的区隔与价值系统得以建立，“新媒体”再次被神话化，其自身的转型选择也得以正当化。另一个常用的符号资源是前文述及的“黄金十年”，但在“新媒体”话语中“黄金十年”不再意味着“过去”，而是指向“未来”。如有人表示当前是新“黄金十年”的空前机遇期（样本 494）。可见，“转型”对这些新闻人意味着希望和机遇，通过建构“转型”这一符号资源的积极方面以及实际的转型行动，新闻人不断在变动的结构中重新寻找得以安身的位置感。

而对纠结中的新闻人来说，“转型”仍意味着对职业境遇造成巨大困扰的结构化因素，所以他们的话语阐释也体现出较多的负面情绪。有人表示，看着传统媒体“一点点死在你面前，心情太复杂”（样本 487），也有人伤感地吟起了北岛的诗句：“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些新闻人依然将新媒体视作传统媒体的对立面，并以“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阐释职业身份认同的危机感，这份危机感的生成正是来自于他们在新闻场域位置感的变动。

另一方面，对于留守的新闻人而言，抱怨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他们选择策略性地运用各种符号资源重塑传统媒体的正当性。有人强调，应积极尝试“思维革新、理念突破、话语变化”（话语 453），也有人指出“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已在引领新闻的 3.0 时代，故而传统媒体应抓住最后的时间（样本 497）。可见，对他们来说，“转型”意味着在传统媒体内部推动革新，而非选择个人职业转型。此外，为了巩固自身在新闻场域的位置感，另一个越来越被频繁运用的符号资源就是“理想”。下文将展开相关讨论。

(三) “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的交锋

根据图2,“新媒体”话语和“理想”话语在新闻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都有上升的趋势,同时,两个话语的共现频次也逐年上升,并在意义上形成了交锋。一方面,新闻人愈加倾向于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咎于新媒体转型引发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愈加频繁地运用“理想”这一符号资源抵御结构化冲突下的危机感,重塑自身在新闻场域的位置感。例如有新闻人表示,正是因为传统媒体走向末路,他们的理想才“变得一地鸡毛”(样本436),也有人指出,新闻人都不谈理想谈赚钱去了(样本450)。由此,新闻人在理想的失落与新媒体转型之间建立了人为的因果关系,“赚钱”被矮化的同时,“理想”再一次被神话化。

对于选择留守的新闻人而言,用以缓解其身份认同危机的最重要的符号资源就是“理想”,不少人都强调,不论互联网裹挟着媒体行业怎么变,新闻仍是一个需要理想才能干下去的职业(样本413),甚至称如果“干错了职业,请重新选择”(样本424)。可见,以新闻理想为界,选择留守的新闻人区隔了自身与选择职业转型的新闻人,从而将“理想”继续神话并巩固为新闻职业存在的正当性基础,维护其在新闻场域的位置感及身份认同。

以上有关“新媒体”话语的分析表明,中国新闻社群首先在反思性地阐释“未来”的基础上建构“新媒体”话语。由于技术革新和行业转型引发的风险加剧,新闻社群在阐释“新媒体”话语时也从早期整体的乐观态度转变为复杂的多样情绪。

其次,中国新闻社群还对“转型”这一符号资源展开了意义争夺,根据自身在新闻场域中所处位置的不同,新闻人分别策略性地建构了“传统媒体”神话和“新媒体”神话,从而正当化其转型或留守的职业选择。其中,传统媒体新闻人希望通过“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巩固其在新闻场固有的优势性地位,转型的新闻人则旨在扭转二元之间的价值判断,但他们的策略性意图都是在变动的新闻场域结构中重新寻找得以安身的位置感。

再者,“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的交锋趋势愈加显化。积极转型的新闻人以“理想”的难以为继正当化其职业选择,纠结的新闻人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咎于新媒体转型带来的压力,留守的新闻人则选择运用“理想”这一符号资源在自身与选择转型的新闻人之间作出区隔,从而重塑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巩固自身的身份认同。可见,随着新闻业结构化转型过程的深化,“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之间的张力也逐渐凸显,两者互为形塑并形成意义交锋,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多重时空语境中共同构成了一个杂糅的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

七、讨论与结论

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的两个核心话语:“理想”与“新媒体”。研究发现,“理想”话语主要建立在“理想/现实”这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

并通过溯及“过去”反衬“现在”。在话语再生产的过程中，新闻人策略性地运用了民国时期、1980年代和“黄金十年”的新闻业集体记忆及个人化框架下职业理想与新闻实践间的矛盾等符号资源，建构了新闻业从未获得的独立性、自主性、规范化与权威性的知识神话。这一神话建构过程是新闻人作为行动者对新闻场域结构化转型的回应，其目的在于批判当前新闻业现状，重塑规范化的新闻理念和专业准则，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维护新闻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地位。换言之，“理想”话语也是一种批判性和抗争性话语。

“新媒体”话语主要建立在“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并以展望“未来”反思“现在”。新闻人根据其在新闻场域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的阐释策略，以期维护或挑战新闻社群固有的权力关系。通过对“未来”和“转型”这两个符号资源的意义争夺，新闻人分别策略性地建构了“新媒体”神话或“传统媒体”神话，以此正当化其转型或留守的职业选择，在变动的新闻场域结构中重新寻找得以安身的位置感。随着新闻业转型过程的深化，“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之间也越来越呈现出意义交锋的趋势，并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多重时空语境中构成了一个杂糅的当代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

概言之，中国新闻社群对“理想”话语和“新媒体”话语的建构是一种策略性行动，这一行动体现出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新闻人作为新闻场域内的行动者，必然受到结构的制约，其话语阐释无不体现出这些结构化因素的作用，但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新闻人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重塑建构中的结构，从而在新的权力关系中争取优势性地位。话语建构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行动，这种行动遵循的是布尔迪厄所言模糊的逻辑，既受到所在场域的规则制约，又具备反思性。

因而，“理想”话语和“新媒体”话语一边在被神话化的同时，一边也在被破解。即使话语经常呈现出去历史化和神话化的面貌，新闻人仍然具备对知识神话的反思能力，且在话语再生产的过程中，新闻人会根据自身在新闻场域所处位置的不同，运用多种不同的符号资源，调整相应的阐释策略，从而赋予新闻职业不同的意义，建构有利于己方的权力关系。换言之，话语作用的领域就是意义争夺和权力关系展开的领域。因而，话语的意义始终处于持续不断的协商和冲突过程中，权力关系也并非无往不胜，而是随时存在抗争和重构的可能性。

此外，中国新闻社群在社会化媒体上展开的话语阐释行动，不仅包括新闻社群内部的话语共享或话语争夺，还包括与经济、政治、学术等场域的话语互动，故而这种行动也呈现出表演性的特征，社会化媒体的特性及其聚合的社会网络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表演性。本文着重关注了话语建构的策略性和反思性，未来研究可以更进一步探讨话语建构的表演性。

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编号：13NDJC168YB）的成果。

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注释

- [1] Foucault, M.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2] Zelizer, B. ,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3, 1993, pp. 219 - 237.
- [3] Zelizer, B. ,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3, 1993, pp. 219 - 237.
- [4] Schudson, M. , What is a reporter? The private face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J. Carey (Ed.), “*Media, myths and narratives*,” Beverly Hills: Sage, 1988.
- [5] Zelizer, B. ,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3, 1993, pp. 219 - 237.
- [6] Zelizer, B. ,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3, 1993, pp. 219 - 237.
- [7] Beck, U. ,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 [8] Beck, U. ,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 [9] Bhabha, H. ,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 [10] [法] 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11] O’Sullivan, T. et al. ,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 [12] [法] 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13] Weber, M. ,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14] Bourdieu, P. ,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5] Bourdieu, P. ,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6] Bourdieu, P.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7] Foucault, M.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18] Foucault, M.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 [19] Foucault, M.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 [20] Foucault, M.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21] 郑保卫:《理想·理念·理性——兼论新闻工作者的荣辱观》,《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第27-30页。
- [22] Soloski, J. ,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eporting of the new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11, No. 2, 1989, pp. 207 - 228.
- [23] 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24] Boym, S. ,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 [25] Bourdieu, P.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6] 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李金铨主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3-464页。
- [27] Bourdieu, P.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8] 邱兵:《我心澎湃如昨》,2014年7月,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7279, 2014年11月8日。
- [29] 王超:《澎湃出生即落后,理想主义救不了媒体》,2014年7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5cd770102uyypw.html, 2014年11月8日。
- [30] 何小手:《澎湃起来,澎湃下去》,2014年7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gzNzIyNQ==&mid=200311839&idx=1&sn=e1f3caccd17f9e9ca590fc7e7391a-19a&scene=3#rd, 2014年11月8日。
- [31] Alexander, J. C. , “Cultural pragmatics: Social performance between ritual and strateg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2, No. 4, 2004, pp. 527 - 573.
- [32] 刘春:微博原文,2014年9月, <http://www.weibo.com/1662766362/BoUaPhM2U>, 2014年11月8日。
- [33] 丁远、孙睿翮:《朱长振:从调查记者到街头小贩》,《青年记者》2014年第11期,第33-35页。
- [34] Bourdieu, P.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5] 张志安:《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新闻记者》2011年第2期,第42-47页。
- [36] Foucault, M.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37] Foucault, M.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38] Bourdieu, P. ,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Ideal” and “New Media”: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Chinese Journalistic Community

· *Ding Fangzhou*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two dominant discourses in Chinese journalistic community: “ideal” and “new media”. The result shows that “ideal” discourse mainly builds its foundation on the dichotomy of “new media” and “traditional media”, as well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are used as symbolic resources to produce the myth of “ideal”, criticize current situations of Chinese journalism industry, rebuild professional norms and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s. On the other hand, “new media” discourse mainly builds its foundation on the dichotomy of “new media” and “traditional media”, as well as the reflexive “future” upon “present”. Journalists strategically construct the myths of “new media” and “traditional media” based on their sense of positions in the journalistic field to legitimate their choices over career change and reconstruct the sense of positions i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journalistic field. Along with the dramatic transition happening within the Chinese journalism industry, the “ideal” discourse and the “new media” discourse tend to demonstrate their struggle over meanings and jointly form a hybrid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ese journalistic community in the multiple context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23 Press Control, Discourse in News Processing, and Reports’ Impact

· *Liu Yi, Hao Xiaoming*

Through a survey of journalists working at five provincial metropolitan newspapers in Chengdu, Guangzhou, Fuzhou, Quanzhou and Xiame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perceived pressure from professionalism, the perceived discourse power of journalists in news processing and the perceived influence of news report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while the perceived external pressur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perceived discourse power in news processing. In the meantime, perceived external pressure and perceived impact of news reporting are likely to be negatively related, although such a relationship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ased on our data. Additionally, the rank of journalists in the newsroom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perceived discourse power in news processing and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their news reports. Journalists who think they have a greater say in news processing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that their news reports have bigger social impact.